



On the Scientific System and Exactness of Textbooks: On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ourth edition,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Xu Zhixiao

Abstract: For the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literary realm, it is an encouraging reality that the booming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in Mainland China since the 1980s has maintained its vigor. A hallmark of such a booming situation is that the textbooks introducing the topic have come out one after another. These textbooks, with their different compiling approaches and discourse styles, have on the whol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enhancing the related research in China'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mong these textbooks, the one that was published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seems to enjoy the most influential status, not least because the press is affiliated to China's most prestigious university. However, a close scrutiny of this textbook would reveal that it has left much to be desired in terms of basic theoretical groundings, accuracy of conceptual expressions and some layout technicalities. In general, these defects, which in my view could have seriously misled its readership, can be boiled down to the following six aspects that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in some detail: (1) the different meanings between "perspective" and "vision" are not properly distinguished, leading to an erroneous explanation of "perspective" in the Chinese linguistic context, and it appears that the author of the textbook took it for granted that these two words are interchangeable; (2) when it comes to the concept of "comparison" bilingually, its connotation in Chinese has an added sense of affinity or intimacy. This is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easily neglected if a researching author is not careful enough. It is very obvious that these two "comparisons"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equivalents, which the author of the textbook was apparently not aware of; (3) the term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omparison" have not been defined correctly throughout, and in my view a clear definition for each should be offered at the outset; (4) some linguistic symmetric beauty is achieved at the expense of logical integrity in English sense in all the subtitles of the textbook; (5) to put the so-called "Russian School" and "Chinese School"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side by side with their French and American counterparts is a myth, because the very existence of the former two is theoretically questionable in the first place; and (6)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of the textbook, translation studies belongs to the domai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hich I think is a wrong categorization, for the two disciplines, although sharing some limited common ground, have very different orientations and focuses. The above six points therefore could perhaps well remind the Chinese scholars tha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mainland calls for more serious attention to some basic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a more rigorous effort to shape it better before the discipline can stand on a truly solid foundation.

Keywords: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oblems; vision

Author: Xu Zhixiao earned his MA in Literature from Fudan University in 1982, and PhD from Peking University in 1988. He is currently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Besides, he is Chair Professor of North West Normal University, and had been invited to make speeches by Harvard University, Yale Univers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Columbia University, Tokyo University and Yansei University, etc.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On Chuci; Classics and Comparison;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On Ancient Chinese Poetry by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Brief History of Fu in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of Chuci and Sino-Foreign Comparison*.

教科書的科學性和嚴謹性如何存續

——評北大版《比較文學概論》（第四版）存在的問題

徐志嘯



[摘要]伴隨着比較文學學科在中國大陸的興旺發展，多部比較文學的基礎理論教科書也陸續問世。在這些教材中，尤以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比較文學概論》影響最大。但閱讀該書第四版後卻發現，它在涉及比較文學的基本理論、教科書的撰寫體例、概念文字的準確表述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問題。這具體體現在六個方面：（一）對“視域”與“比較視域”概念的誤釋。“視域”與“比較視域”牽涉到對英文原詞的理解和詮釋，英文原詞“Perspective”的準確釋義應該是透視與洞察力，但被翻譯成了漢語的“視域”；而漢語“視域”的英文對應詞是“Vision”，即視角、看法等。由對“視域”的誤釋，導致了對“比較視域”的誤釋；該書的編寫者還將其作為比較文學學科的支撐框架，未免言之過重了。（二）將漢語“比”字與比較文學之“比”牽強附會。中國漢字的“比”字有親合、親近之義，而比較文學也有“比”字；該書的編寫者看到兩者同是比，於是想當然地認為，漢語的“比”與比較文學有相近或相親的意義瓜葛。這顯然是望文生義。（三）對“比較文學”與“文學比較”兩個概念的關係判斷有誤。（四）為追求文字的整齊劃一，該書所有章題均為三個字，失卻了邏輯完整性。（五）俄國學派與中國學派問題。“俄國學派”並無獨立成派的理論支撐，“中國學派”也祇是中國部分學者的良好願望，將俄國、中國列為與法國、美國並舉的比較文學學派，與事實不符。（六）翻譯研究與譯介學問題。翻譯研究不屬於比較文學的研究範疇，比較文學涉及的翻譯的分支學科應該是譯介學，它是從宏觀上研究語言轉換過程中的現象和問題。這六大問題的存在，提示基礎理論教科書的編寫者需要特別注意它的科學性和嚴謹性；同時也表明，中國的比較文學學科應進一步深化和開拓。

[關鍵詞]《比較文學概論》 問題 視域

[作者簡介]徐志嘯，1982年在復旦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1988年在北京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比較文學專業、古代文學專業），甘肅省特聘“飛天學者”，西北師範大學講座教授，兼任中國屈原學會副會長，曾應邀赴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東京大學、延世大學、臺灣大學、香港嶺南大學、澳門大學、朱拉隆功大學講學；主要從事比較文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楚辭綜論》、《古典與比較》、《20世紀中國比較文學簡史》、《北美學者中國古代詩學研究》、《近代中外文學關係》、《簡明中國賦學史》、《楚辭研究與中外比較》等。

比較文學學科自20世紀80年代初在中國大陸復興以來，由於適應了改革開放的國情和國際學術交流的需要，迅即呈現出蓬勃向上的趨勢。伴隨着學科的興旺發展，該學科的基礎理論教材也相繼在中國南北各地陸續問世，迄今已達數十種之多。一門學科的基礎理論教材能出現如此狀況，無疑是一種非常好的現象，它可以促使這門學科互補互識、相互促進、健康發展；當然，這也帶來一些問題，即如何科學、嚴謹、正確把握並梳理好學科的系統理論，如何準確地描述、傳授學科的整體框架及其內涵，成為諸多編寫學科教科書的學者們必須面對的課題。在迄今已出版的衆多比較文學教材中，影響較大的要數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比較文學概論》一書了。這不僅僅是因為該書已被中國教育部研究生辦公室推薦為研究生教學用書，而且還入選了21世紀全國高等院校比較文學課程基本教材和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規劃教材；更主要的是，該書自2002年6月問世以來，短短十二年間，已先後有了2005年9月第二版、2006年5月第三版、2014年1月第四版，可見受衆之多。關於該書的優勢和長處，筆者曾於2003年應該書主編之邀寫過一篇書評；^①同時，也給主編寫過意見信，指出書中的錯誤和不妥之處。然而，十多年過去了，儘管該書第四版較之前三版的部分章節有了修改補充，在內容方面充實了不少具體案例，總體字數也增加了，但仍然存在不少問題。出於對學術研究嚴謹性的考慮，對比較文學學科進一步深化開拓的考慮，也出於對該學科實際教學效果的負責，筆者擬就閱讀《比較文學概論》（第四版）^②發現的六個問題提出看法，以求教於教材編寫者和學術界諸方家。

問題一：“視域”與“比較視域”

“視域”和“比較視域”是《比較文學概論》這部教科書特別提出的一個重要的理論性概念，也是作為比較文學本體論的核心提出來的。該書第二章第五節中提出“比較視域”，第三章的整章談“視域”（“視域論”），第八章談比較詩學時涉及了“比較視域”的內容。按理說，作為教材，談“視域”和“比較視域”，應該有一個邏輯順序，即先談什麼是“視域”，後談什麼是“比較視域”，再談“比較視域”在比較文學學科中的作用和意義，從而由簡單進入複雜、由表象步入深層。但是，這部教材卻是先談“什麼是比較視域”（第二章第五節第二小節），而後在第三章第一節纔出現“視域和比較視域”概念，分別闡釋何謂“視域”和“比較視域”。這就在邏輯順序上完全顛倒了。

如果說邏輯順序顛倒祇是一個技術性小問題的話，那麼這部教科書關於“視域”和“比較視域”的解釋就是一個大問題了。“視域”原本是個外來引進的概念，英語原文是“Perspective”，其漢語釋義有多種：（1）透視畫法，透視圖；（2）透視效果，透視感；（3）遠景，景觀；（4）（觀察問題的）視角，觀點，想法；（5）（事物內部的）恰當關係，（對事物的）合理觀察，洞察力。如果從比較文學角度理解，“Perspective”的英語原意更多是指透視和洞察力——以高遠的視角，在廣闊的背景下，穿越時間和空間，透視、洞察跨越國度、民族、語言、學科和文化的文學（包括文學家及其文學作品，以及文學現象等）。這種透視和洞察力，可以是全球世界範圍的，也可以是國際性地區範圍的，但決不局限於某國或某民族文化地區的小範圍內；人們藉此窺探文學的內在規律或特點，探索其間雙向或多向的相互關係，比較其中的殊異性與類同性。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個“Perspective”乃是特指比較文學領域內宏觀的宏闊眼光、視野和穿透力，也即研究比較文學所必需的一種高於、遠於一般視界的、跨越時空的、能透視跨國跨文化之文學的宏觀視野。這種視野與穿透力，不以國度、區域、語言、文化等為限，而是超越國度，跨越民族、語言、文化之界限的；它屬於世界範疇與全人類範圍。這就是說，在“Perspective”概念上，不能也不可以再加上形容詞“Comparative”（比較的）予以限

^① 徐志嘯：“創新 嚴謹 開放——評北大版《比較文學概論》”，《中華讀書報》2003-07-03。

^② 《比較文學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樂黛雲顧問，楊乃喬主編。

定或修飾了，因為其概念含義本身已具有了跨越和超度的表述，自然談不上對其本身再作比較了。這是就英語“Perspective”本意而言，而不是就漢語翻譯的“視域”一詞而言的。漢語“視域”一詞如果用英語表述的話，應該是“Vision”或“Field of Vision”，它不同於“Perspective”。這部教材之所以會有“視域”及“比較視域”兩個詞出現，恐怕問題就出在這裏——將漢語的翻譯，誤解成了英語的原意，而後又將其加以拓化和演繹。其實，將英語“Perspective”漢譯成“視域”，祇是取了英語原詞的部分含義；嚴格意義上說，“視域”這個譯詞並不完全符合西方學者在比較文學理論中予以闡發與運用的原意，自然也不符合比較文學本身所需要具備的透視和洞察力。而且，對於“Perspective”來說，它本身是不受任何國家、民族、地域、語言、文化約束的，是一個超越時空的宏觀思維力。

由此，建立在“視域”基礎上的所謂“比較視域”（Comparative Perspective），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因為，“Perspective”本身不需要“Compare”，也不太能“Compare”，如果硬要比較，恐怕祇能是“Vision”的比較；自然，在它前面加上修飾語“Comparative”也是多餘的了。所以，這部教材中論述的所謂“視域”，應該屬於“Vision”或“Field of vision”，而不是“Perspective”，兩者不是一回事。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編寫者在這部教科書中對比較文學所下的定義判斷，將“比較視域”抬到了“本體”的高度——“在21世紀的全球化時代，比較文學在相對自治的學科理論體系建構上得以安身立命的本體就是比較視域。一言以蔽之，比較文學研究作為一門學科成立的基點——本體就是比較視域。簡言之，比較視域就是比較文學的本體。”^①也就是說，在編寫者看來，“比較視域”是比較文學這門學科的命根子；沒有所謂“比較視域”，比較文學這門學科也就不能成立了。由於編寫者把“比較視域”置於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比較視域”本身是否能成立，是否符合比較文學的理論實際，是否科學合理，則是要打上一個大問號的，因此，這個判斷和結論未免言之過重了。另外，在結構安排和邏輯順序上，這段話也有些超乎尋常——它寫在還沒有闡釋“什麼是比較視域”之前，更寫在闡釋什麼是視域的第三章第一節“比較視域的特徵”之“視域與比較視域”小節之前。這不僅讓人覺得突兀，更覺得邏輯上的難以理解和接受——作為教科書循序漸進的闡發順序，顯然結論走在基本概念的闡釋之前了。

問題二：漢語“比”字與比較文學

這部教科書的第二章第五節在談到漢語“比”的基本意義時，特別說到了它涉及比較文學原理的建構，認為它有兩種基本意義可與比較文學的“比較”本意相聯繫，由此可以聯繫到它們的共通處。其中，對第一種基本意義的闡釋，顯然牽強附會了。編寫者在引證包括東漢許慎（約58—約147）的《說文解字》在內的多種中國古代文獻資料如《論語》、《禮記》、《管子》、《玉篇》、《廣韻》及其註疏、釋義後，判斷說，“比”可引申為“親近”、“親合”、“和諧”的意思，“這樣一條意義鏈正契合比較視域對兩種國族文學關係或文學與其他相關學科進行透視所獲取的親合意義。這裏所說的親合意義，就是雙方的共同關係”。^②說“比”字在中國古代漢語的成分中有親近、親合之意，將“比”釋義為密、近，引申為親近、親合，是沒有問題的；但這不等於說，漢語的“比”字與比較文學的“比”就能掛上鉤了——由兩者都是“比”字，引申掛鉤，甚至同比較文學的兩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學關係可以掛上鉤，這過於牽強附會了。須知，比較文學的文學關係研究，並非專門研究兩者關係的親合或親近，即便兩國或兩民族的文學存在關係有明顯的影響因素或接受成分存在，那也與所謂的親近、親合聯繫不起來，更無法同比較文學的影響與接受研究硬相牽連。它祇是表明，兩個國族文學的作品之間可能存在著相互影響或接受的關係，而不能判斷為這是人們習慣意識上的所謂親合和親近關係。學者們研究兩個國族文學彼此

^{①②} 《比較文學概論》，第127、128—129頁。

二〇一六年 第二期

間可能存在的傳播與影響，其狀況或程度如何，應屬於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或稱關係研究，它是對客觀存在的文本事實作實證性的研究；如果兩種文本的文學作品之間確實存在有影響因素，那也與所謂的親合、親近不是同一層意思，祇能說它們之間有影響關係。這部教材的編寫者在“比”字上做文章，說中國漢字的“比”字有親合、親近之義，而比較文學也有“比”字，兩者同是“比”，於是，漢語的“比”與比較文學就有相近或相親的意義瓜葛了。這純屬望文生義了。

問題三：“比較文學不是文學比較”嗎？

這部教科書的第二章第五節第三小節，定名為“比較文學不是文學比較”。作為一個命題，這句話有它成立的道理，猶如中國古代邏輯學中的“白馬非馬”；但作為一部教科書的章節標題，它是一個概念性的判斷，沒有表述完整，顯然難以獨立成立，必須要把它講完整。以“白馬非馬”為例，從邏輯學上說，這個命題是對的。“白馬”即鬃毛呈白色的馬，不是黑色鬃毛、黃色鬃毛的馬，也不是廣泛意義上泛指的馬；但如果從日常生活的角度去理解，白色鬃毛的馬當然是馬，是馬的一個品種；如果不是馬，難道它是驢？是豬？從這個角度認識，“白馬非馬”會被人們以為是個生活笑話。同樣道理，說“比較文學”不是“文學比較”，從概念的絕對性上說確實如此。比較文學是什麼？它不是一般概念的文學比較，而是特指跨國度（民族）、跨文化、跨語言、跨學科的文學比較。那麼，“比較文學”難道真的不是“文學比較”嗎？它不屬於文學比較的範疇嗎？答案應該是的。比較文學也是文學比較，祇不過它不是一般意義的文學比較，而是有特殊規定的前提和範疇條件下的文學比較，它被限定了比較的範圍。“比較文學”實際上是“文學比較”大範圍內的小範圍，即“文學比較”是大圓圈，“比較文學”是這個大圓圈內的小圓圈。所以，應該說，“比較文學”是“文學比較”，但又不等同於“文學比較”，它所比較的範圍，與“文學比較”的範圍不完全合一。由此，這個章節的小標題準確的表述應當是：“比較文學不等同於文學比較”，而章節內的具體闡述，自然也需要作相應的調整。

問題四：“範例論”及其他

《比較文學概論》的編寫者為了追求全書九章標題的整齊劃一，從文學性考慮，一律使用三個字——發展論、本體論、視域論、學派論、方法論、範例論、翻譯論、詩學論、思潮論。這樣做，或許能給讀者造成一定的文字整齊感；但作為一本嚴肅的教科書，所要追求的是切合教科書本身內容的科學、規範、準確和嚴謹，在這個前提下，纔是盡力追求語言文字的規範典雅。反觀《比較文學概論》中這些章題的“某某”論，實際含義並非專門論述“某某”——論發展？論本體？論學派？等等。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說，這些標題都應該加上“比較文學”四個字纔合理。因為，每章所論，乃是比較文學發展論、比較文學本體論、比較文學視域論、比較文學學派論，等等。

這當中，最不合理的是該書第六章“範例論”。範例者何指？這裏的範例，顯然是指由論述比較文學理論而衍生的具體案例，或謂具體說明比較文學理論的實例——或是影響研究範例，或是平行研究範例，或是跨學科研究範例，或是跨文化研究範例。问题是，範例本身需要“論”嗎？這些範例本是用來闡發理論的，或者為理論的具體實踐作展示的。如果範例本身需要論——“論範例”，那就與所述內容風馬牛不相及了。不僅如此，這一章的四節標題，也是為追求文字的整齊劃一，一律採用了統一的模式——先兩個字（“互動”、“接受”、“影響”、“身份”），而後是冒號，接着是各節所要闡述的主題內容。問題在於，這一章每一節前的兩個字是否符合該節的內容呢？如果去除這兩個字，所有標題內容都可獨立成立，冒號前所加的兩個字實在是多餘的。而且，有些節的內容，加了兩個字，反而不切合實際內容。例

如，第二節“接受”，似乎中國文學與俄蘇文學的關係祇是接受。難道祇有中國文學接受俄蘇文學，沒有俄蘇文學接受中國文學？兩者之間沒有相互影響、沒有任何互動？又如，第三節“影響”，似乎祇有中國文學影響日本文學，沒有日本文學影響中國文學。難道日本文學不曾影響中國文學？中日兩國文學之間沒有相互影響？沒有相互接受？沒有任何互動？——這些都是讓人無法理解的。

除了第六章外，第一章的“發展論”也有一些問題。其一，按理說，既然標題為“發展”，那就應該是談由源到流、由低級到高級的循序發展，但第一章的第一節內容卻是：“全球化與比較文學的多元文化語境”。這完全是在闡述21世紀全球比較文學發展的現狀，而不是介紹比較文學學科的起始與開端，更不是開宗明義何謂比較文學，比較文學是如何產生的。直到第二章第二節，該書纔安排談“比較文學的萌芽”、“比較文學的誕生”。作為一部教科書的規範編寫法，應該是第一章先闡述何謂比較文學，比較文學是如何產生的，這是怎樣一門學科，而後再談這門學科的發展歷史，以及它發展到今天21世紀的現貌狀況。然而，該書的編寫者卻將其先後順序顛倒，令人費解。其二，第一章的第二、第三節的標題末尾均用了“溯源”一詞，似乎這兩節內容都是在溯源，然而實際內容卻是“西方比較文學發展史”與“中國比較文學發展史”，均非旨在溯源，而是闡述從源到流的發展過程——從萌芽誕生，到發展興盛。其三，第一章第三節第一小節的標題為“中國古代的比較文學研究”，這完全不符合客觀歷史和比較文學實際。因為，比較文學學科並不誕生在中國，中國古代也沒有今天意義上的“比較文學”這個名詞，更沒有這種意識，那麼，何來中國古代的比較文學研究呢？更何況，即便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曾出現過今天意義上的比較文學的若干表現形式，那也是朦朧狀的、不自覺的、無意識的比較，不少甚至可稱為比附，根本談不上比較文學研究。

問題五：存在公認的“俄國學派”、“中國學派”嗎？

《比較文學概論》的第四章“學派論”，闡述了四個學派——法國學派、美國學派、俄國學派、中國學派。將學派單獨列為一章，的確有其必要。原因在於，在比較文學的發展史上，作為開創者和繼承開拓者，法國學者和美國學者功不可沒，他們建立起了具有各自風格特色和切實內涵的獨家學派，在國際學術論壇上各樹一幟，並得到了國際比較文學界的公認。但是，如果將俄國專列為一派，而且與法、美兩國並舉，那就根據不足了。因為，俄國學術界雖然也倡導比較文學，也有一些成果不同於法、美，但俄國的比較文學並沒形成有別於法、美兩家且具有自家獨特風格及內涵的學派，它祇是法、美兩家學派的拼湊而已，談不上已形成了獨立一派；將其與法、美學派並駕齊列，顯然是編寫者的有意拔高。如果硬要作這樣的安排，那麼，還應有印度學派、日本學派等等。至於中國學派問題，在中國比較文學界（包括港澳臺地區）確有部分學者曾經一度極力提倡過，並試圖賦予有別於法、美學派的特別內涵，如闡發研究（主要是臺港學者）、跨文化研究、變異學研究等，但這主要還是中國學者（包括港澳臺學者）從弘揚東方中國文化/文學的角度出發，努力與西方學者在同一平臺上進行對話，力圖通過這種對話，作中西文化/文學的比較，讓世界特別是西方認識東方中國，讓中國文化/文學走向世界，以此獲得在國際學術舞臺上與西方的平等地位。毫無疑問，這樣的動機與出發點完全可以理解，也應該朝這個方向努力。但客觀現實是，一個學派的真正形成，並非自我鼓噪可成，它必須具備必要的條件，並且這些條件能被國際同行所承認，要經得起學術的考量——它必須具有實在的內涵，形成一支富有實力的學者隊伍，擁有一批被國際學術界認可的一流學術成果，具有區別於它家學派的獨立價值。而到21世紀的今天為止，所謂中國學派，尚在襁褓之中，還未獲得國際學術界的認可，祇應將所謂的中國學派、俄國學派採取附錄形式或者另外的寫法，不應與公認的法國學派、美國學派並列為一章。

問題六：翻譯研究還是譯介學？

儘管《比較文學概論》的第七章“翻譯論”是全書所有篇章中改動次數最多、改動幅度最大的，第四版與第一版的面目已全然不一，但第四版的第七章還是難如人意。問題在於，作為比較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涉及翻譯的內容究竟應以何樣的面目與內涵出現在比較文學的學科範疇內？或者說，屬於跨越國度/民族的文學語言的轉換，在比較文學的學科理論中究竟該扮演怎樣的角色？這就涉及比較文學是否應包括翻譯研究本身。這裏的翻譯研究，指純粹的對翻譯本身的研究。從《比較文學概論》的全書看，所謂“翻譯論”的全部內容，全都是在談翻譯研究——翻譯研究的名與實，翻譯研究的範圍和內涵，翻譯研究的未來。從比較文學來說，涉及翻譯的內容，固然是其內涵之一，但一般的比較文學教科書或比較文學論著，大都將這個範疇內涉及翻譯的內容稱為譯介學。也就是說，關於與翻譯有關的比較文學分支，是專指將翻譯作為中介的學問，也即譯介學。我們不能忽視“中介”一詞，它是跨國/民族語言轉換的橋樑——在兩國文學語言的轉換過程中，它剖析透視由翻譯而產生的兩國/民族文化背景的異同和文學作品轉換之間的諸多問題，諸如過程、原因、特點、變異、類同、作用、影響等，還包括譯者本身的多種因素和條件。也就是說，比較文學研究的譯介學，並不着重於翻譯本身——語言文字、詞彙語句、文體風格等是否翻譯得準確到位，是否達到了“信、達、雅”的標準，這屬於翻譯學的範疇。譯介學是專門研究翻譯在語言轉換過程中，起了什麼作用，達到了何種效果，產生了什麼影響，還存在哪些弊端，以及其與社會、歷史、文化等大環境可能的關係——這纔是譯介學所關注、所包含的內容。至於具體的實際的翻譯——講究字、詞、句等是否翻譯準確，有何錯誤弊病，這屬於純翻譯的研究，是翻譯學的內容，不是比較文學學科範圍內的內容。用通俗的話來說，比較文學關心的是翻譯的宏觀問題，翻譯研究關心的是翻譯的微觀問題，如同在綜合性或文科高校，比較文學屬於一個專業，翻譯學屬於另一個專業，它們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有着較大的差異。當然，該書第七章第二節也述及了翻譯與旅行、文化、政治、哲學、性別等話題，這從內容上似乎屬於宏觀話題，但此章總體的定位與立論失誤了，給讀者造成的錯覺是，將翻譯本身的研究替代了比較文學的譯介學。

以上就是筆者在翻閱《比較文學概論》第四版後所發現的問題，學術界對於其中有些問題也許會有不同的意見和看法，筆者之所以寫出來向學術界求教，是覺得作為理論基礎建設的教科書編寫，應當特別注意它的科學性和嚴謹性。由於《比較文學概論》是一部有三十多位學者集體參與、經過多年辛苦努力成就的教科書，如果筆者所提問題能夠引起編寫者們的重視，在下一版時得到改正，那將會對比較文學學科的深化開拓和進一步的健康發展有益。